

1979-1981年山东省棉花种植政策调整的历史考察

刘照峰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着力改变我国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农林牧比例失调的状况。山东省作为全国主要产棉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棉花生产有了很大发展,但由于粮棉矛盾等问题,棉花生产一度陷入困局,生产发展迟滞,供需矛盾突出。1979年后,山东省逐步确立了“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并且调整了棉农口粮和棉花收购价格政策,辅之以其他因素,共同促成1980年棉花特大丰收。但是,1980年粮食产量下降,致使传统粮棉矛盾在1981年年初再次凸显。但在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新的政策环境和政治生态里,中共中央决定扩充粮食进口规模作为调节手段,山东省也坚持改革方针不动摇,最终实现了粮棉双丰收,顺利化解新的问题。1979-1981年山东省棉花生产方面的政策调整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对当前乡村产业振兴仍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改革开放初期;山东省;棉花;政策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4)04-0037-09

收稿日期:2024-06-01

基金项目: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课题资助“习近平新型职业农民观研究”(2023SKPYM-Y03)

作者简介:刘照峰(1994-),山东德州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4.04.013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不仅给中国带来农业生产的“超常规增长”,而且凝聚了改革共识、推动了改革全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农村第一步改革的核心要旨,奠定了农村改革的制度基础,是故,许多研究者把研究重点放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过程及其成效上。^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产增收起到重要作用的农业生产结构调整问题,却没有得到多少关注。部分研究者注意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多着意于调整后的结果,而对实际调整过程着墨不多。^②基于此,本文尝试挖掘、利用山东省、聊城市、菏泽市、章丘区等各级档案馆档案史料,结合相关已刊资料,围绕1979年到1981年山东省棉花种植政策调整过程,对曾受到全国瞩目的“山东省棉花大丰收”的前因后果做一专门研究,以期丰富、深化我们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村改革“政策逻辑”的理解。

一、改革开放前山东省棉花生产的困局

山东植棉始于元代,由于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适宜,至明、清时期已有相当之规模。^③高唐县和夏津

①如丁龙嘉:《改革从这里起步——中国农村改革》,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吴象:《中国农村改革实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李嘉树:《信息传递与政策抉择——1977-1980年安徽农村改革路径的考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李嘉树:《风起山南:安徽农村改革溯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赵树凯:《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魏众:《从“责任田”实践到家庭承包制——基于安徽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21年04期。

②如萧冬连:《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陈吉元、邓英淘等:《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发展——回顾与展望》,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陈锡文:《中国农村改革:回顾与展望》,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李文炳主编:《山东棉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第1页。

县因植棉闻名,素有“金高唐”“银夏津”美誉。新中国成立后,山东省一直是全国主要产棉区之一,其滨县杨柳雪大队被周恩来总理称之为“棉区的一面红旗”^①。就地理区域分布而言,鲁西北和胶莱平原棉区是山东省两大主要棉区。鲁西北平原棉区主要分布在菏泽、聊城、德州、惠民和济宁西部地区。胶莱平原棉区主要分布在昌潍地区。

由于生产关系和物质条件落后及战争破坏,山东省1949年皮棉总产仅有162.09万担。^②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山东省皮棉总产于1952年达到338.88万担,1956年达到434.48万担,但由于“大跃进”运动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破坏,直至1967年,皮棉总产才达到436.3万担,恢复到1956年的水平。山东皮棉总产于1970年达到建国以来最高水平546.43万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改革前的皮棉总产再也未能达到这一水平,1978年仅有308.22万担。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粮棉矛盾和棉花政策不尽合理是两个关键问题。

20世纪50年代,黄河流域棉区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为五大棉区^③之首。然而由于20世纪60年代后北方粮食紧张,全国粮食格局一度出现“南粮北调”局面。70年代初,国务院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了尽快扭转南粮北调的局面,强调北方要实现粮食自给。在粮食自给压力下,黄河流域棉区普遍出现“重粮轻棉”,粮棉争面积、争劳力、争肥料的问题,棉花生产发展缓慢;而长江流域棉区因粮食供应较好,粮棉矛盾相对较少,棉花生产发展很快。^④

如果说全国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南粮北调”,那么山东省粮食生产格局的一个基本问题则是“东粮西调”^⑤。尽管在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召开时,山东省已经“初步做到了粮食自给”^⑥,但山东省内不同地区之间粮食生产并不平衡,正如山东省革委指出的,“东粮西调的局面还没有完全扭转”。^⑦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山东省开始着重解决鲁西北四区粮食自给问题。鲁西北四区是传统棉区,此时既要实现粮食自给,也要完成种植棉花的任务。类似于杨柳雪的少数大队可以实现粮棉双丰收,但是大多数生产单位却难以做到。很多生产单位为了粮食上纲要,有的提出了“向棉田要粮”的口号,有的出现了“面积上挤,肥料上挪,劳力上拉,管理上松”的现象。^⑧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山东省的植棉面积由1970年的1051.2万亩降至1978年的941.2万亩。^⑨鲁西北四区植棉面积下降更为明显,比如德州地区植棉面积由1970年211.8万亩降至1978年的161.6万亩^⑩,下降了23.7%。

由于重粮轻棉,对棉农植棉积极性影响最大的棉农口粮和棉花收购价格政策并不尽合理,有时还得不到有效落实。根据1970年国务院关于棉农口粮的规定,“棉农口粮标准不低于邻近产粮区”。^⑪这一规定对保证棉农口粮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重粮轻棉的大环境下,在实际落实时,棉农口粮仍可能得不到保证。例如,按照山东省革委的政策规定,1978年要兑现粮食三亿一千万斤,结果各地从农村的统销粮中仅兑现一亿四千万斤,还差一亿七千万斤。山东省粮食局提出“因粮食年度已到,再加即将麦收,不再兑现”,各

①《棉区的一面红旗——记山东省滨县杨柳雪大队紧跟毛主席创造棉粮双高产的事迹》,《人民日报》1970年2月14日。

②本段棉花产量数据均参照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1984),内部资料1985年,第112至113页。

③中国现代棉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冯泽芳将中国棉区划分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和华南5个棉区。

④朱启荣:《中国棉花主产区空间布局变迁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⑤“东粮西调”指把东部烟台、昌潍等地的粮食调至西部的鲁西北四区,即菏泽、聊城、德州、惠民四个地区。

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1970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887页。

⑦《中共山东省革委核心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1970年11月6日),档号0006-003-0521-003,章丘区档案馆藏。

⑧《全省棉花花生烤烟大麻工作会议纪要》(1976年12月31日),档号0006-002-0388-009,章丘区档案馆藏。

⑨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1984),内部资料,1985年,第107页。

⑩山东省德州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德州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2,196页。

⑪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情况的报告·节录》(1970年2月14日),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资料室:《农村政策文件选编》(三),内部资料,1980年,第18页。

地纷纷表示不满，要求“坚决兑现，否则影响种棉积极性”。^① 尽管如此，山东省粮食局仍以粮食不宽裕为由仅兑现了三千六百万斤。

此外，由于棉花收购价格较低，植棉显得不划算，棉农的物质利益得不到保证，难以调动起群众的植棉积极性。下表反映了 1950 年至 1978 年粮棉作物比价情况。

表 1 1950 年至 1978 年粮棉作物比价情况表

(以粮食为交换品，数量为 100)

被交换品	被交换品比率(%)							
	1950	1953	1957	1962	1965	1970	1975	1978
棉花(皮棉)	10.03	12.47	11.55	14.38	11.86	13.17	12.96	12.60

注:计算公式:比率=粮食加权综合平均收购价格/被交换品综合平均收购价格*100

资料来源: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物价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第 66 页。

一般认为，1965 年的“棉粮比价比较适宜”，此时北方棉花、小麦为“一比八点八”。^② 上表反映出 1970 年至 1978 年的粮棉比价高于 1965 年，这意味着 1970 年至 1978 年的棉花价格偏低。

总之，由于粮棉矛盾以及相应的棉农口粮和棉花收购价格政策不尽合理，改革前的 1970 至 1978 年的棉花生产陷入困境，也对山东经济和人民生活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棉花产量满足不了本省纺织工业的需要。山东省 1976 年需要调入棉花 170 多万担，1977 年仍需要大致相等数量的棉花。^③ 另一方面，鲁西北四区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落后地区，1977 年社员人均分配仅有四十元。^④ 不过，我们也须注意到山东棉花在这一时期并非乏善可陈。山东省棉花研究所于 1976 年选育成功的鲁棉一号，将对解决原有棉种不适应山东气候的问题，促成山东省改革开放初期的棉花大丰收起到重要作用。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棉花方针政策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逐步对棉花方针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山东省迎来了棉花连年丰收，棉区人民生活也因此得到极大改善。“要发家，种棉花”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鲁西北农民的共同记忆。

为了扭转失衡的农业生产结构，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坚决地、完整地执行农林牧副渔并举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⑤ 这一方针直接针对现实问题，就山东省而言，除棉花外，另一重要经济作物花生 1978 年的总产为 9.39 亿公斤，同样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2.83 亿公斤。^⑥ 故而，秦和珍^⑦ 指出，各地在安排农业生产计划时，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合于种粮食的就多种粮食，适合于种棉花的就多种棉花，适合于种花生的就多种花生”。^⑧

与种植方针的转变相适应，山东省植棉政策也得到调整。一方面，山东省提高了棉农的口粮标准，最低为人均 365 斤。以生产队为单位，凡每人向国家提供皮棉 20 斤的，“口粮保证 380 斤”；超过 20 斤的，

①《关于棉花生产上几个重要问题的汇报提纲》(1978 年 5 月 25 日)。

②纺织工业部研究室编:《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上)，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0 年，第 114 页。

③《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 年 1 月 21 日)，档号 0005-004-0403-002，莱阳市档案馆藏。

④《关于批转〈鲁西北四区农业发展规划(草案)〉的通知》(1978 年 6 月 19 日)，档号 0006-002-0398-014，章丘区档案馆藏。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 年 12 月 22 日)，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上)，内部资料，2003 年，第 18 页。

⑥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农业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24 页。

⑦秦和珍于 1977 年 1 月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革委会副主任，1979 年 12 月山东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任常务副省长。

⑧《秦和珍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1 月 20 日)，档号 0009-002-0238-002，菏泽市档案馆藏。

“每多交售 1 斤皮棉增加口粮 4 斤”；棉农口粮如果本队不能解决，“要列入国家统销指标，保证供应”。^① 鉴于主要的植棉区惠民、德州、聊城、菏泽地区 1978 年人均口粮分别为 358 斤、352 斤、371 斤和 344 斤^②，均低于 380 斤口粮标准。因而这一口粮政策能够满足大多数棉农的要求。另一方面，山东省棉花收购价格在 1978 年提高 11% 的基础上，1979 年又提高了 20%，^③ 而且各地在完成交售任务（以 1976 年至 1978 年三年平均收购量作为基数）后，超售部分加价 30%。^④ 棉花收购价格提高幅度并不小。然而，与此同时，粮食收购价格也提高了 20%，超售部分加价 50%。群众普遍反映“种棉还是不如种粮”，因而不愿意种棉花，比如“临邑县计划植棉面积十万亩，目前真正落实的只有七万亩，有个支部书记说，‘撤了我的职也不种棉花’”。^⑤

总之，尽管棉农口粮能够基本满足棉农需要，但此时新方针针对性稍显不足，棉花收购价格未尽合理。1979 年初，一些地方仍然出现“抓棉花生产决心不大，劲头不足，种植面积减少的倾向”^⑥。为了把这种倾向扭转过来，分管农业的省委书记李振在棉花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干部要提高认识，批评了那些“专算小账，认为种棉花划不来，就不想种了”的做法。^⑦ 山东省委强调政治觉悟的做法既从侧面反映了种棉花还并不划算，又反映了其对群众物质利益关注不足。由此观之，1979 年山东省棉花种植形势并不乐观。

在各个植棉区中，聊城地区先行一步，率先取得突破。1979 年 2 月 21 日，聊城地委在给省委的报告中提出，本地区“发展农业应该重点抓好棉花”，并请求省里帮助解决粮食包购任务、生产队陈欠贷款、棉花生产资金、农药和机械问题以及棉花机械化试点等五个方面的实际问题。^⑧ 7 月 31 日，聊城地委书记明确提出“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⑨的棉区发展方针。此时，中共中央和山东省委均坚持“以粮为纲”前提下的“因地制宜”，故而，聊城地委在地区范围内明确提出“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仍需要相当的政治勇气。关于这一方针，聊城地区内各方面的意见也存在一些分歧。有人担心扩大了棉田，保不住粮食；有人则担心资金、肥料有限以及群众植棉技术不适应等问题。面对群众和干部的顾虑，聊城地委没有急于要求各地扩大面积，只是强调“把过去历年种不足的 180 万亩棉田种足，并在水、肥资金上予以保证”。^⑩

新方针在争议中仍然贯彻下去，当年即取得良好成效。至 1979 年底，“全区一百八十万亩棉花，单产和总产都比去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左右……全区社员平均分配收入，可由去年的四十六元增加到六十元；社员口粮可由去年的三百七十一斤，增加到四百斤”。^⑪ 临清县因为种棉花，全县社员“每人平均分配比上年增加三十元”。^⑫ 东阿县古官屯公社土地盐碱涝洼，自然条件很差，多年来是全县倒数第一，1979 年“一鸣惊人”，“全社八千一百亩棉花，由去年亩产 36 斤，一下增到 139 斤，总产达到 113 万担（笔者注：原文数据有误，应为 1.13 万担），等于前七年全社棉花的总产量”。^⑬ 而山东省 1979 年皮棉总产仍旧较低，仅为

①《秦和珍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1 月 20 日），档号 0009-002-0238-002，菏泽市档案馆藏。

②（79）鲁农社字第 2 号《关于一九七八年全省农村人民公社收益分配情况的报告》（1979 年 3 月 14 日）。

③《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3 月 5 日），档号 0015-002-0191-017，泰安市档案馆藏。

④纺织工业部研究室编：《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上），北京：纺织工业出版社，1980 年，第 114-115 页。

⑤《山东省贯彻中央〔1979〕4 号、5 号文件的情况》（1979 年 3 月 3 日），档号 A165-02-0080-001，山东省档案馆藏。

⑥《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3 月 5 日），档号 0015-002-0191-017，泰安市档案馆藏。

⑦《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3 月 5 日），档号 0015-002-0191-017，泰安市档案馆藏。

⑧宋杰主编：《聊城地区棉花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年，第 169 至 171 页。

⑨《张程震同志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7 月 31 日），档号 0004-004-242-002，聊城市档案馆藏。

⑩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十年巨变——山东在改革开放中前进》，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243 页。

⑪《张程震同志在地直各部门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11 月 18 日），档号 0004-004-245-002，聊城市档案馆藏。

⑫《白如冰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0 年 1 月 2 日），档号 0006-003-0589-001，章丘区档案馆藏。

⑬《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79 年 12 月 29 日），档号 A101-08-0160-031，山东省档案馆藏。

333.61 万担^①，平均亩产皮棉只有 41 斤^②。聊城地区率先提出“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且成效显著，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促进 1980 年棉花丰收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时，全国的棉花生产形势同样不容乐观，这使得国家要拿出有限的外汇储备进口棉花。其中，1978 年中国进口棉花 1019 万担，1979 年进口 1097.2 万担。^③ 鉴于当时棉花生产状况，农业部于 1979 年年初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关于棉花生产问题的紧急报告》，“着重汇报了棉农口粮偏低、粮棉比价不合理等等问题”。^④ 1979 年年底，国务院召开全国棉花生产会议。李先念明确提出：“在集中产棉区，第一位的任务就是要把棉花生产搞上去”；从明年新棉上市，棉花收购价格“在现行价基础上，提高 10%，超购加价 30% 的政策不变”，从而，粮棉比价可以大致“恢复到一九六五年的水平”。^⑤ 此外，为解决棉农口粮这一关键问题，他还专门提出解决棉区粮食问题的三点措施。

山东省皮棉总产 1979 年提高不多，比历史最高水平少 200 万担，相较于江苏省 1000 万担的产量差距更大。因而山东省委急于提高棉花产量，并于 1979 年底 1980 年初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棉花生产会议。李振肯定了“聊城地区提出‘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口号是正确的”。^⑥ 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明确提出对于集中产棉地区和单位，“主要的任务是向国家提供商品棉”，国家“不再向植棉队分配粮食征购任务”，棉农口粮如果不能自给，“由国家按政策保证供应”。^⑦ 此外，白如冰强调各级干部要给群众讲清种棉花合算的问题，“种一亩棉花，亩产皮棉一百斤，就相当于亩产八百到一千斤粮食”，这样一种粮棉比价“大体上是合理的”，因而“种棉是合算的”。^⑧ 这一态度转变，恰恰反映了山东省委依靠政策解决生产难题，即把生产和农民的物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调动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0 年 1 月 3 日，山东省人民政府以 1 号文件的形式发布《关于加速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明确棉区要以棉为主，并强调棉花价格、棉农口粮、口油、自留棉、油饼返还和奖售化肥等政策规定“都要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执行，并确保兑现”。^⑨

在新方针的指导下，全省作物布局得到调整。棉田面积原计划由 814 万亩增加到 930 万亩，实际扩种到 1100 万亩以上；棉田由土地质量较差地块调到土地质量较好地块的达 200 万亩，植棉县由 82 个集中到 61 个。此外，全省也加大了对棉区的支援力度，“棉区化肥供应比上年增长 22.8%，农药增长 65.3%，喷雾器增长 1.5 倍”。^⑩

各个植棉区、县也积极转变思路，比如惠民地区的生产方针改为“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全区植棉面积“由去年的一百万亩扩大到一百四十万亩”。^⑪ 德州地委强调“在棉区抓好棉花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是第一位的中心任务”。^⑫ 德州地区陵县动作迅速，根据《大众日报》报道，至 1980 年 1 月 10 日，“23 万亩棉花已全部落实到队和地块”。^⑬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菏泽地区就因为口粮未能自给而仍然不敢大胆做出调整。菏泽地区 1979 年粮食总产为 34 亿 9000 万斤，要做到自给，“至少要三十八亿斤粮食，还有三

① 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统计年鉴》（1984），内部资料，1985 年，第 113 页。

②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0 年 8 月 15 日），档号 0015-002-0212-015，泰安市档案馆藏。

③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 年，第 383 页。

④ 纺织工业部研究室编：《新中国纺织工业三十年》（上），第 119 页。

⑤ 《认清形势，采取措施，发展棉花生产》（1979 年 12 月 15 日），《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编辑组编：《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下卷），第 475、479 页。

⑥ 《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摘要》（1979 年 12 月 29 日），山东省德州地区行署棉办：《棉花生产典型文件汇编》，内部资料，1980，第 43 页。

⑦ 《白如冰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0 年 1 月 2 日），档号 0006-003-0589-001，章丘区档案馆藏。

⑧ 《白如冰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0 年 1 月 2 日），档号 0006-003-0589-001，章丘区档案馆藏。

⑨ 《关于加速发展棉花生产的决定》（1980 年 1 月 3 日），档号 0017-002-0221-001，章丘区档案馆藏。

⑩ 《山东棉花大丰收的调查报告·第二次修改稿》（1981 年 2 月），档号 A180-01-0003-046，山东省档案馆藏。

⑪ 《措施切合实际 群众满怀信心 惠民地区因地制宜采取四项经济措施加快农业发展》，《大众日报》1980 年 2 月 9 日。

⑫ 山东省德州地区行署棉办：《棉花生产文件典型选编》，内部资料，1980 年，第 71 页。

⑬ 《陵县认真贯彻全国和省棉花会议精神 及早动手安排今年棉花生产》，《大众日报》1980 年 1 月 20 日。

亿斤的缺口”^①。地委书记周振兴反复提醒，不管是“粮棉兼顾，以棉为主”还是“粮棉一起抓，重点抓棉花”，哪一种提法“都不意味着可以放松粮食的生产”，切不可“偏到一头去”。^② 直至1980年5月，菏泽地委才突出了因地制宜的思想，提出：“孤立的抓粮食，粮食也是上不去的，……有些同志把‘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作为农业的一个指导思想，地委认为是正确的”。^③

此外，棉花生产责任制的建立和新棉种的推广也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山东省1979年初在棉花生产上推行“五定一奖”责任制，1980年逐步推行联产到劳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群众植棉积极性。“鲁棉一号”于1976年繁育成功，在经过初步试验后逐步推广，1976年40余亩，1977年1200多亩，1978年50000余亩，1979年达到120多万亩，1980年进一步扩大到868万亩。^④“鲁棉一号”适合山东气候，具有高产稳产的特点，提高了棉花单产。

总体而言，植棉区、县响应中央和山东省委方针政策调整，充分发挥传统棉区优势，加之，生产责任制逐步推行，“鲁棉一号”大范围推广，几个集中产棉区都获得大丰收。聊城地区“在七九年大丰收的基础上，八〇年总产又增长二倍，达到三百二十三万担”；菏泽、德州两地区“总产量都超过二百万担，比七九年增长三倍多”。^⑤ 山东省棉花1980年总产量“一千零七十四万担，比上一年增产七百四十一万担，增长二点二倍”。^⑥ 1980年棉花大丰收提高了全省的人均收入，人民公社人均集体经济分配收入超过100元，比1979年增加20元左右，是农业集体化以来增加最多的一年。聊城地区在棉花种植上走在前列，其人均分配在全省九个地区中，由过去的第七位，上升到第二位。高唐县人均分配由上年的48元猛增到163元，夏津县由45元增加到154元。^⑦

三、粮棉矛盾的再度凸显与化解

1980年，山东省迎来棉花大丰收。然而，由于自然灾害以及扩种经济作物引发粮田减少，山东省粮食总产下降，由1979年的494.4亿公斤减为476.8亿公斤。此时山东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能否保住1979年的棉花产量甚至有所提高；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不因扩种棉花影响粮食产量。第二个问题得到了更多注意。

改革开放前，山东省皮棉总产最高的年份是1970年，所以，山东省委最初设想到1985年前把产量恢复并稳定在1970年的水平，然而1980年的棉花大丰收迅速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其增产幅度之大、范围之广，确是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⑧。恰是由于1980年棉花大丰收突然而至，能不能保住1980年的产量并有所提高，人们存在疑虑。而且1980年棉花大丰收的一个重要客观原因是气候条件好，主要表现为光照足，积温多，霜期来得晚，对棉花生长十分有利。有人就认为1980年“棉花大丰收主要是气候条件好，有极大的偶然性”。^⑨ 尽管这一观点并非普遍观点，不过对1981年能否达到1980年天气状况，人们普遍没有把握。山东省副省长、省农委主任朱奇民坦言，“今年除了气候条件没有把握之外，其他条件可以说都比去年好”。^⑩ 但是由于1981年国家计划仅要求山东皮棉总产达到600万担，留有很大余

①《周振兴在全区县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5月16日），档号0009-001-0552-001，菏泽市档案馆藏。

②《周振兴在全区农业生产责任制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80年1月29日），档号0009-001-551-001，菏泽市档案馆藏。

③《在全区县社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5月16日），档号0009-001-0552-001，菏泽市档案馆藏。

④庞居勤、李文炳等：《鲁棉一号》，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3年，第4页。

⑤《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2月15日），档号A165-02-0104-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⑥《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2月11日），档号A165-02-0104-002，山东省档案馆藏。

⑦《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2月15日），档号A165-02-0104-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⑧《山东棉花大丰收的调查报告·第二次修改稿》（1981年2月），档号A180-01-0003-046，山东省档案馆藏。

⑨《李振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2月11日），档号A165-02-0104-002，山东省档案馆藏。

⑩《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年2月15日），档号A165-02-0104-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地。所以,总的来说,山东省委并不特别担心棉花产量,而是认为只要充分发挥有利条件,克服不利因素,“夺取今年棉花大丰收,是完全可能的”。^①

山东省委更为关注的是如何不因扩种棉花影响粮食产量。民以食为天,不管如何重视经济作物及多种经营,面对省内 7300 多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山东省委不敢放松粮食生产。由于 1980 年粮食减产,征购由上年的 36.56 亿公斤减为 29.15 亿公斤,然而各方面对粮食的需求量有增无减,当年的购销逆差达到 10.08 亿公斤。^②另外,由于 1980 年全国粮食同样减产,粮食问题亦得到中共中央的关注。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告诫道:“不能因为发展经济作物而挤了粮食产量。粮食还是第一位。人不吃饭,牲口不喂料,是不行的。”^③

鉴于陈云的告诫,又面临着自身粮食不足的问题,1981 年初,山东省委对粮食问题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重视。首先,山东省委强调要在粮食自给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作物,“农业内部结构的调整,作物布局,发挥优势”,都不能脱离粮食自给这个前提。^④其次,山东省委认为目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比例基本合理,应当稳定几年,把主攻方向放在提高单产上^⑤。再次,山东省委鼓励鲁西北四区应在搞好棉花生产的同时,把粮食生产搞上去,逐步做到粮食自给。而且为激励经济作物区农民提高粮食自给水平,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决定从 1981 年起,对各地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的办法,一定三年不变。粮食调出地区,“上交任务定下以后,生产队再多卖粮食,按议价收购”;粮食调入地区,“在包干调入数之外,不再增加”。^⑥最后,山东省委减少了棉农的口粮奖售。根据国务院相关规定,山东省委和省政府决定从 1981 年起,对棉花包购基数以内的,每交售一斤皮棉,奖售标准化肥二斤,超过包购基数的,每收购一斤皮棉奖售粮食二斤,所需的粮食由中央和省里解决。^⑦相对于 1979 和 1980 年的相关政策规定,这一规定实际减少了对棉农口粮的奖售力度。

随后,山东省委常委到各地市开展调研,纷纷强调保证粮食面积的问题。白如冰在菏泽强调:“千万千万不能减少粮田面积,千万千万要把粮食生产搞上去,不能降下来”。^⑧秦和珍在聊城强调,“保证粮田面积,落实措施,一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并对聊城棉田面积稳定在 270 万亩表示满意。^⑨总之,1981 年上半年,山东省委总的倾向是限制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保住粮食面积。

1981 年 7 月,国务院负责同志到济南召开棉花生产座谈会,对扭转山东省委限制棉花种植面积的做法起到重要作用。19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一部分粮、棉、油、糖以满足自身需要。而在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要比进口棉、油、糖更为有利。所以,在新的以改革创新为导向的政治生态下,中央采取了更加灵活、务实的开放政策。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曾谈道:“进口粮食比进口棉、糖,对我国经济效果好,得利大。”^⑩1980 年,中国仍然进口棉花 1795.2 万担^⑪。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在棉花生产座谈会上肯定了以进口粮食替代进口棉花的办法,“如果是一斤棉花,国内给二斤粮食,这肯定是非常合算

①《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 年 2 月 15 日),档号 A165-02-0104-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②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省志·粮食志》,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7 页。

③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1980 年 12 月 16 日),《陈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80-281 页。

④苏毅然:《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81 年 1 月 13 日),陈保民、王珉等编:《情系山东五十年——苏毅然山东工作纪实》,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180 页。

⑤《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 年 2 月 15 日),档号 A165-02-0104-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⑥《朱奇民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的发言》(1981 年 1 月),档号 A165-02-0107-001,山东省档案馆藏。

⑦《朱奇民同志在全省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1981 年 2 月 15 日),档号 A165-02-0104-003,山东省档案馆藏。

⑧《白如冰在菏泽地委常委、行署副专员会上的讲话》(1981 年 2 月 26 日),档号 0009-001-563-007,菏泽市档案馆藏。

⑨《秦和珍同志在聊城地县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81 年 2 月 27 日),档号 0004-004-287-005,聊城市档案馆藏。

⑩《万里同志在棉糖座谈会总结会上的讲话摘要》(1980 年 7 月 12 日),档号 A101-08-0227-110,山东省档案馆藏。

⑪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2 年,第 383 页。

的”。^① 其意在提醒山东省不必要担心超购一斤棉花给二斤粮食的政策不能兑现。其实，发展棉花生产对山东省的经济发展十分有利，所以山东省委也并非不想大力发展棉花生产。现在国务院负责同志明确表示可以以进口粮食来代替进口棉花，给山东省委吃了一粒“定心丸”。

此外，1981 年小麦产量的提高也有助于打消山东省委的顾虑。1981 年，山东省“小麦面积比去年减少二百四十九万亩，总产达到了一百七十三亿四千万斤，比去年增加十九亿四千万斤”。^② 一方面上级保证兑现棉花超购奖励的粮食，另一方面小麦又获得丰收。因而，省委不再对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大加以限制。白如冰于当年 9 月到聊城视察，就提出按照内部账，“棉花种五百万亩，收五百万担，粮食种三百万亩，保二十四亿斤”。^③ 相对于当年 2 月聊城地区提出的 270 万亩植棉面积，这一植棉面积几乎翻了一番。

鲁西北四区粮棉双增产则基本打消了山东省委的顾虑。1981 年，鲁西北四区成功地做到了以棉促粮，实现了粮棉双增产。白如冰肯定了鲁西北四区的成绩，“从实际出发，‘以粮保棉，以棉促粮’，较好地发挥了当地的优势，夺得了粮棉双丰收”。^④ 比如聊城地区的棉花面积由 183.73 万亩扩大到 489.65 万亩，总产量由 104.46 万担扩大到 702.25 万担；粮食面积由 909.75 万亩减少到 609.96 万亩，而总产量并未减少，反而由 1262760 吨增至 1651755 吨。^⑤ 粮食产量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因为种棉花收入提高，在土地上有更多投入，同时也能得到大量棉饼作为肥料。既然鲁西北四区在棉花面积扩大、粮食面积减少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仍在增加，山东省委自无必要对棉花面积的扩大加以限制。直至 1984 年，山东省委基本未控制植棉面积。1984 年山东省粮食播种面积达到 2568.6 万亩，棉花产量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3450 万担。

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着力扭转不合理的农业生产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山东省着手调整棉花生产的方针政策。我们注意到，1979 年棉花方针政策的初步调整并没有能够扭转棉花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唯有聊城地区在棉花方针政策调整上更进一步，率先突破，当年棉花生产实现大丰收。1979 年底 1980 年初，中共中央、山东省委对棉花方针政策进行了全面调整。与此同时，聊城地区 1979 年棉花大丰收也起到了示范作用，促使其他植棉区在 1980 年主动适应棉花方针政策的调整。在上述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山东省在 1980 年彻底打开了棉花生产的局面。1980 年粮食减产却又使得粮棉矛盾再度尖锐起来。不过由于中央的粮食进口政策以及鲁西北四区取得粮棉双丰收的成绩，这一矛盾又很快得到解决。山东省棉花丰收的局面持续到 1984 年。山东省棉花方针政策调整是全国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缩影，其中的成功经验也为今日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有益启示。

第一，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转而遵循经济效益优先的务实思路，对粮食增产和棉花增产均加以充分肯定。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农民群众在计算植棉还是种粮更合算的基础上，开始做出自主的选择。山东省委对群众的这些思虑和做法，也持公开提倡态度，给农民群众以更多自主权。这是中国共产党农业农村工作思路发生重大转变的极佳诠释。

第二，正确处理好粮棉关系。粮食种植与棉花种植既有相互冲突的一面，但也有相互促进的一面，这在此前过分强调“以粮为纲”的时代并未被充分意识到。鲁西北四区粮食产量的增长与植棉收入用于购买肥料及奖售大量棉饼密不可分。因而，不能认为棉花方针政策调整带来棉花面积的扩大就必然挤了粮食。不过，棉花面积的扩张总有一定的限度，陈云同志提出的“无粮则乱”的思想必须高度重视。

第三，实事求是地发挥典型示范作用。1979 年，棉花方针政策调整的力度并不大，但是聊城地区先行

①《国务院负责同志在棉花生产座谈会上的重要指示》（1981 年 8 月 5 日），档号 1-111-16-3，淄博市档案馆藏。

②《李振同志在全省农业生产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1981 年 9 月 1 日），档号 A165-02-0104-001，山东省档案馆藏。

③《白如冰同志在聊城的讲话》（1981 年 9 月 18 日），档号 0004-004-287-003，聊城市档案馆藏。

④《白如冰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1 年 11 月 15 日），档号 0004-005-263-008，聊城市档案馆藏。

⑤《山东省聊城地区史志编纂委员会》：《聊城地区志》，济南：齐鲁书社，1997 年，第 137-138 页。

一步，提出了“粮棉一齐抓，重点抓棉花”的方针，率先取得重大突破。聊城在植棉方面取得的成绩，并不是靠树典型带来的资源倾斜，而主要靠着干部群众落实植棉政策、先行先试的勇气。当然，典型示范在这一时期仍是有效的政策工具。1980年，山东省肯定了聊城地区提出的方针，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总结其经验，从而迎来了1980年的大丰收，使得山东棉花跃上一个新台阶。

第四，以开放精神适量维持粮食进口。在当时健康而富有活力的政治生态下，中共中央选择了灵活务实的方针政策，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生产，摒弃过去“吃进口粮是修正主义”的观点，开始“每年进口一千万吨到一千五百万吨粮食”。^① 粮食进口的适当增加，并非不重视粮食生产，而是为了因地制宜地促进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山东省委也才更容易抛开过去的很多顾虑，支持干部群众持续扩大植棉面积，实现棉花生产的跨越式发展。

An Investigation of Cotton Policy Adjustment History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1979-1981

LIU Zhao-feng

(School of Marxism,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CPC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ade great efforts to change the irrational internal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nd the imbalanced ratio of agriculture, forestry, and animal husbandry segments in China. Shandong Province, as one of the major cotton-producing areas in China,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otton produc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owever, owing to the problems such a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cotton and grain development, cotton development was once trapped in trouble and developed slowly, with th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volved. After 1979, the province gradually established the policy of “equal importance to grain and cotton, with a focus on cotton” and adjusted the policies regarding cotton farmers' grain ration and cotton purchasing price,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big harvest of cotton in 1980 plus the impact of other factors. However, the decline in grain output in 1980 caused the tradition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grain and cotton to become prominent again in early 1981. In this contex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vigorously import grain, and Shandong Province unswervingly adhered to the reform policy. As a result, both grain and cotton witnessed a harvest, finally resolving the new conflict. The adjustment of cotton policy in Shandong Province during the period 1979-1981 represents a miniatur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tructure in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which is of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urrent rural industry vitalization.

Keywords: the early stage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Shandong Province; cotton; policy

[责任编辑 山阳]

^①《建立东北商品粮基地是搞活全国农业的关键》(1980年7月28日至8月3日)。